

帝国意识支配下的东亚人口 移动问题研究

——以日本“满洲移民”政策为中心

郑毅

(北华大学 东亚中心, 吉林 吉林 132013)

摘要: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推动并实施了一项庞大的向中国东北的移民计划,同时将朝鲜移民作为辅助战争资源有目的地输入中国东北。在帝国意识支配下的移民潮,不但冲击和破坏了当地农村社会结构,同时人为地制造出民族间的对立与矛盾。将殖民侵略美化为开拓,暴露出日本欲独占中国东北的狂妄野心。

关键词: 帝国意识 “满洲移民”; 朝鲜移民 “满洲经营”

中图分类号: K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4) 10-0119-06

20世纪30年代,日本曾以国家行为方式主导实施了一场以日本农民为主体、以中国东北为目的的大规模人口移动,以所谓的“大东亚战争”为时空背景,与这场对外侵略战争相伴始终。这次大规模人口移动出现时如洪水泛滥,终结时如浮云消散。对于这一历史问题,中、日、韩三国学界多有专门性研究,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层面上基本达到了史学研究的目的,但对帝国意识层面的探究仍有很大的空间,本文即侧重从帝国意识视角探讨这一历史怪象产生的原因。

一、帝国意识视阈下侵略化身为“开拓”

所谓帝国意识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共有的一种价值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共性的内容就是对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历史传统等元素持有一种强烈的自恋情结,对异民族、人种和他国国民保有一种蔑视心态,视帝国和本民族对异民族的帝国主义统治为正当化的意识。

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使日本成为和西方列强一样拥有殖民地的宗主国。作为模仿者,近代日本的帝国意识中无疑兼容了其模仿对象的主体性意识,诸如民族、人种的差别意识,大国主义(爱国主义)意识,文明传播使命者意识等。但日本文化传统的积淀和国情的特殊性,使其帝国意识中具有某些特定的价值观,如皇国意识和天皇制等,尤其是封建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政治文化使其对外的刚性扩张意识更为明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台湾,太平洋三大群岛等相继成为日本帝国的殖民地。进入20世纪40年代,帝国日本在强化对华全面战争和准备对美英开战的过程中,提出并确定了一个野心巨大的战略目标,即建设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帝国是这个标榜“共存、共荣”的势力范围的核心和领袖国家。

作者简介: 郑毅,北华大学东亚中心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战后日本对外政策史、近现代中日关系史。

以西方文明优等生自傲的日本自诩承担着对抗西方、拯救亚洲、开发落后邻国的天赋使命。日本思想史学者竹内好认为“日本文化在结构上是一种优等生文化。秀才们集中于军官学校和帝国大学，而这些秀才支配着日本……自己作为构筑起这些优秀文化的日本文化代表选手，与作为劣等生的人民在价值上完全不同，自己是被选拔出来的。顺理成章，指导落后的人民是自己的使命。指导落后的东洋各国也是自己的使命。这就是优等生情结的逻辑推演。所以，主观上他们是正确的。于是，进一步产生了下面这种反映优等生心理的独断性结论：我们之所以优秀，是因为接受了欧洲文化，因此落后的人民当然会接受我们的文化施舍，也必须接受。”^①“大东亚共荣圈”可以视为日本自赋天命，欲在亚洲建设一个以日本为中心、同欧美列强对等的势力范围的终极表现。

“大东亚共荣圈”一词最早是由1940年7月第二次近卫内阁外相松冈洋右提出的，他在就任外相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称“作为我国目前的外交方针，就是以此皇道的大精神为准则，首先以日满支为其一环谋求大东亚共荣圈的确立。”^②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以政府决策形式将“大东亚共荣圈”固化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帝国对大东亚共荣圈地带居于政治指导者之地位，负有维持秩序之责任……经济上，帝国在上述地带的国防资源方面，要保留优先地位”^③。

到1942年6月，帝国日本用战争方式完成了对覆盖西太平洋、东亚、东南亚等近7955万平方公里，包括4.8亿人口的军政统治^④，这是“大东亚共荣圈”鼎盛时期的状态。

在这样一个依靠当地政权傀儡化、属地统治军政化、被征服国家殖民地化的区域内，日本帝国的军事力量是这一势力范围内能够形成并存的唯一支撑。当然，区域内的人口与资源配置同样要服从于军事需要。人口的移动同资源和产品的流动一样是由日本帝国政府根据需要来掌握、控制的。同重要战略物资、资源类原料普遍由各殖民地区域集中流向日本本土相反，日本人口主要是由本土呈放射状向各殖民地区域移动。

当时的日本社会普遍认为地旷人稀、物产丰盛的中国东北是移民的理想之地，“满洲”是“现代地球上最有力的移住地”^⑤。日本将独占中国东北并使之殖民化看成日本帝国的天赋使命。1927年7月，田中义一首相在东方会议上发表的《对支政策纲要》中，特殊强调“满蒙，特别是东北三省地区，对我国国防及国民生存拥有重大的利益关系，因此，我邦不仅要特殊考虑，而且……作为接壤之邻邦，又不能不感到有特别的责任……万一动乱波及满蒙，由于治安混乱，有侵害我在该地特殊地位和权益之虞时，不论来自何方……都要决定不误时机，采取适当措施。”^⑥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积极附和和田中首相的对华强硬外交，提出对华侵略无需中国人理解的奇论“在他国领土上企划着如何伸展扩大本国的国力，向对方国家叙述自己国家的诚意，这种做法在国际上有没有成功的惯例我们还不得而知。并且在增强国家实力的国策执行之际，如果没有得到对方国家的承认，我们也不能有踌躇逡巡之举。英国对印度的政策刚开始并没有得到印度人的支持；法国人也并没有顾及阿尔及利亚人的反对而放弃对阿的政策；美国人在美国中部地区虎视眈眈，并没有得到土著人给他们的簞食美酒，另一方面我们也恐惧我们所实施的对待中国及满洲制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抵日情绪。我们也正在为这个解决办法而煞费苦心。既然企图发展满洲及中国，就应该做好中国人民有抵日情绪的思想准备，就不能对中国的抗日情绪有恐惧心理，基于既往事实并且基于中国本身的国内形势，我们所实行的国策没有任何值得质疑之处。”^⑦显然，在极度崇拜欧美政治文化的吉田茂看来，英美在印度和美洲大陆的成

①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00-201页。

② 小林英夫『大東亜共栄圏・シリーズ昭和史7』東京：岩波書店、1988、16頁。

③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東京：原書房、1966、481頁。

④ 小林英夫『大東亜共栄圏・シリーズ昭和史7』東京：岩波書店、1988、43頁“大東亜共栄圏”の面積、人口表。

⑤ 矢内原忠雄『満州問題』東京：岩波書店、1934、102頁。

⑥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東京：原書房、1966、102頁。

⑦ 吉田茂『对满政策私見』，<http://www.jacar.go.jp/DAS/meta/OutServlet/>。

功都是源于无视殖民对象的意志，日本帝国在中国东北同样应该如此。

日本学者矢内原忠雄对殖民地的解读“从语义上看，殖民地应含有如下的三个要素：第一是本国人移民；第二是由移民者开垦利用土地；第三是政治上从属于宗主国。”^①“满洲国”名副其实地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且日本帝国作为宗主国向中国东北地区大规模移民，远远超出了以往传统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范畴。从移民的目的角度来分析，日本帝国赋予大规模日本移民以多重使命，治安移民和农业移民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移居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输出和农业开发，它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从移民多安置到靠近中苏边境地带的中国东北北部这一现象来看，其增加军事力量的用意极为明显。

所谓“满洲移民”从1932年开始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为止，被日本政府以“民族迁徙”形式送到“满洲”的日本移民为102 239户、1 220 968人（指普通的开拓团和义勇军开拓团总数）。此外，还有“满洲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由15—18岁青少年组成）约21 986人。^②根据日本驹泽大学浅田乔二教授的研究，日本政府派给“满洲”移民5项政治和军事任务：第一，协助确立和维持“满洲国”的治安；第二，作为防御苏联及战时的军事辅助人员，以协助关东军；第三，解决日本农村的“人口过剩”和“土地饥饿”问题；第四，安置在满洲重工业地区的周边，承担防御任务；第五，成为在“满洲”确立“日本秩序”的中坚力量。^③显然，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真实目的首先是将其作为军事上的辅助人员，而经济和人口压力的缓解则是次要的。

日本学者冈部牧夫认为“日本人农业移民的政策，首先是以巩固日本统治东北而确立人口的基础为目标的，即以增加居住在东北的日本人绝对数量，来确保统治的稳定。所谓的100万户500万人的移民计划，是根据计算推断出20年后的东北人口将为5000万人，日本人将占其中的一成，说明这是一份精心策划的计划。”^④

规模如此之大的官办移民，是在完全无视目的地区民众既有生活状态下强行完成的，它势必会对移入国的社会形态和民众生活造成破坏性冲击，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

二、殖民地化的中国东北成为多种矛盾的聚合区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手法与控制手段，基本上沿袭了日本殖民中国台湾的模式。“日本资本乃随国家势力而入台湾，再随国家及资本的活动而有商品贸易的进行；同时，人口的移动亦随国家及资本的活动而进行。”^⑤

日俄战争结束后，在中国台湾有过殖民地统治经验的后藤新平出任满铁首任总裁，他在《就任满铁总裁情由书》中提出了“经营满洲”的统治理念“日俄的对抗，未必以满洲一战可以结束，第二次战争不知将在哪一年到来。如果胜利在握时，就先发制人；不能操胜，则以自重等待时机；即便开战亦不胜，我仍应留有善后余地。总之，我在满洲必须居于以主制客以逸待劳的地位……其得心应手之计，必当第一经营铁路；第二开发煤矿；第三移民；第四兴办畜牧农业设备……其中必以移民为要务……现在如依靠经营铁路不出十年将得以向满洲移民50万，俄国虽强也不能向我开启战端……我们倘在满洲拥有50万移民和几百万畜产，一旦战机对我有利，则进而做好入侵敌国的准备；于我

① 满史会编《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5页。

② 参见日本外务省调查、大藏省管理局《日本人海外活動の歴史調査》（1949—1950）23册；满洲开拓史刊行会《满洲开拓史》东京：满洲开拓史刊行会，1966。

③ 浅田乔二《日本帝国主义与“满洲移民”》，载孔经纬、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专题国际学术会议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1989年，第306页。

④ 冈部牧夫《伪满洲国》，郑毅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143页。

⑤ 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周宪文译，台北：帕米尔书店，1987年，第125页。

不利，则岿然不动持和以待时机，这便是经略满洲大局的主张……”^①

随后，满铁成为日本“经营满洲”的核心。但后藤新平提出的“不出10年向满洲移民50万人”的计划进展并不顺利，“截至满洲事变的25年间，移居满洲（包括关东州属地商埠地在内）的日本人才只有23万，大部分都是从事各方面开发活动的人员及其家属，农业移民不足1000人”。日本政府认为移民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低，无法同他们竞争”。“反之，中国人向满洲移民，从1923年至1930年间高达290万人，成为世界史上无与伦比的民族大迁移，与日本形成了鲜明对比。”^②中国民众在本国土地上呈自然状态的人口流动，在日本帝国政府看来，反而成为其殖民入侵的最大阻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移民中国东北出现了高速增长的趋势。所谓的“满洲”，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为日本社会各阶层追逐的热点海外地域。“自1932年至1945年，有近30万日本农民服从移民国策，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移居到满洲……除了这些农民之外，在战败前的日本人当中，‘满洲体验’也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着。仅在日本的权益铁路的南满洲铁路（满铁）的从业人员，大致也超过10万人。其他的日本资本的公司职员、官吏、一般侨民，再加上军人、士兵，合在一起最多时有超过100万以上的日本人生活在那里，如把短期旅行者包括在内，以某种形式与‘满洲’有关系的日本人是极其众多的。即便是在距战败33年后的今天（1978），大部分日本人，自己和朋友、熟人的亲戚之中，至少也可以找到一位曾经是‘满洲体验者’！在这种意义上，日本人同‘满洲’的关系，是贯穿整个日本现代史的最的国民体验之一。”^③

1935年以后，大规模向中国东北移入日本农户上升为日本与伪满洲国政府的十大国策之一，制订一项为期20年（1937—1957）的百万户移民计划，目的是稀释中国东北的民族成分，改变中国东北的人口结构。

在日本向中国东北实施移民的过程中，日本国内移民事务由拓务省负责，满洲移居协会负责移民的后援、宣传、训练等事务，在伪满洲国内专门设立以获取移民用地为目的的特殊公司——满洲拓殖公司。

“匪贼掠夺金钱和贵重物品，但并不掠夺土地。满拓（会社）强制收买农民生活的基本条件——土地，失去土地，乃是（中国）农民最痛苦之事。”^④据统计，到1941年初，日本移民侵占中国东北的土地面积达2002.6万公顷，占中国东北地区已耕地和未耕地的2/3，是“日本内部耕地面积约600万町步的3.7倍强”^⑤。大量失地的中国农民被迫进入城市艰辛谋生，或被迫去开发更为荒僻的土地，或加入反日武装，或沦为日本移民的雇工。

作为帝国子民的日本移民入居中国东北后，以开拓蛮荒之地的帝国使命践行者自居，其自身优越感极强，普遍对中国民众持有偏见。日本当政者承认：“在日本内地以及当地，对开拓民的教育，由于灌输了作为国策移民的国士气概，因而徒劳无益地使其自高自大，同时，转化成为对原居地满民族的蔑视观念，并过分地施以殴打暴行，甚至加以杀害，而且这常常是集体的行为；因而，给满民族以被压迫、被迫害的感觉，为此使他们对开拓民感情激化，并加剧了某些满族民众的不稳定，并转化成为反日情绪的事例也屡见不鲜。”^⑥关东军的军事占领与日本移民的殖民开发构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14年侵略史的一个实相。

① 鹤见俊辅『後藤新平伝』東京：太平洋協会出版社、1943、31-33頁。

② 满史会编《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11页。

③ 冈部牧夫《伪满洲国》，郑毅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3-4页。

④ 野村佐男《开拓关系问题（一）》，转引自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孟宪章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7页。

⑤ 高乐才《日本“满洲移民”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45页。

⑥ 冈部牧夫《伪满洲国》，郑毅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150页。

大批日本移民的涌入使中国东北地区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进程遭受严重的破坏,形成了一种新的殖民地色彩浓厚的社会结构,中国东北社会矛盾趋于复杂化,阶级间对抗与民族间矛盾交织在一起。

三、带有工具属性的朝鲜移民

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越境移民现象早已有之。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出现了日本移民和朝鲜半岛移民同时涌入中国东北的局面,使中国东北地区的民族关系更趋复杂化。

日俄战争后,朝鲜半岛作为对俄战争的战利品被日本帝国纳入自己的版图之中。日本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对这段历史给出这样的解释“日俄战争后,日本并吞了韩国。为什么要并吞韩国?并吞的理由何在?简单地说,一是为了东方的稳定和东方的和平;二是为了日本的安全,即自卫……换言之,在此之前的灾祸和混乱可以说全部起源于朝鲜。日清(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都是因为朝鲜而引起的。日本不想打第三次决定朝鲜命运的战争,才取消了徒有虚名的韩国的独立,将他并吞。”^①日本右翼学者依然用这种充斥着帝国意识的思维方式,去向日本社会鼓吹其对邻国侵略行为的所谓“合理性”与“公正性”,着实令人诧异。

1910年,日韩合并,日本人大量进入朝鲜半岛,挤压了朝鲜民众的生存空间,使大批朝鲜人迫于生计而移居中国东北。“迨至日本帝国主义强化侵略政策之前,各地的中国人和朝鲜人之间的关系是融洽的。当然两者间的关系,是以中国军阀对朝鲜农民的统治和中国地主对朝鲜农民的剥削为前提的,但远比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以后的情况好得多。”^②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政府对于朝鲜人移民中国东北采取鼓励政策,一方面缓解日本在朝鲜半岛殖民统治的内部压力,输出矛盾;另一方面以朝鲜移民权益的保护名义,扩大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实际控制,“万宝山事件”就是例证。因此,这一时期的朝鲜移民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成为释放内部矛盾的工具性质的输出移民。

日本并吞朝鲜半岛后,一方面在朝鲜半岛内挤压朝鲜民众的土地与生存空间,为日本国内人口的移入腾出地域空间;另一方面将朝鲜半岛的破产农户作为日本帝国的二等臣民移至中国东北,以补充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人口数量的不足。“由于九一八事变的战乱,部分朝鲜族人因其追随日本对东北的侵略,被视为日本侵略者的走狗而陷入困境,而刚刚成立不久的‘满洲国’政府因缺乏应对的能力,所以由朝鲜总督府和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出资,开展救济事业。”^③

伪满洲国成立后,“朝鲜总督府作为统治朝鲜殖民地的最高权力机构,为了缓解朝鲜国内的民族矛盾,利用拓务省促进日本移民之机,也想推行朝鲜移民政策。然而,关东军作为‘满洲国’的总后台,掌管全东北的社会治安和秩序,出于治安和军事上的考虑,尽管积极促进日本人武装移民,但对朝鲜移民却采取消极甚至反对的态度”^④。这是因为日本独占中国东北之后,朝鲜移民对于日本帝国而言失去了以往的利用价值,而日本人移民中国东北成为优先考虑的国策行为。后经朝鲜总督府与关东军会议,决定对朝鲜移民暂时采取顺其自然的放任政策。九一八事变后,由朝鲜半岛迁入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移民仍逐年增加,据伪满洲国国务院统计处的调查,1938年中国东北已有1 117 892名朝鲜人。^⑤至“1945年日本战败时,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人口总数(包括早期迁入的朝鲜族人和

① 中村粲《大东亚战争的起因》,载历史研究委员会编《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9页。
② 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孟宪章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66页。
③ 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各論)』東京:謙光社、1973、806頁。
④ 孙春日《中国朝鲜族移民史》,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33页。
⑤ 满洲国通信社编《满洲开拓年鉴》,长春:满洲国通信社出版部,1941年,第276页。

朝鲜人移民),推断达150万以上”^①。

1939年,朝鲜总督府拓务次官田中武雄提出“经营满洲”的前提,应以日本人为核心,“另一方面,从统治朝鲜的立场出发,新归附的两千万同胞的人心向背,乃是政治上的极大问题”。“在海外发展,大陆雄飞,均以日本人为核心。同时,又须使得外地新归附人民各得其所,逐渐皇民化才能得益,这难道不是极为必要的吗?”^②

经过日本政府、朝鲜总督府、伪满洲国方面的协调,朝鲜总督府在1939年1月制定出朝鲜移民政策方针:(1)对于在伪满洲国的朝鲜人。从日本帝国的立场出发,归根结底要以其为日本臣民,按其能力与内地人平等对待;从伪满洲国的立场出发,以五族协和之建国精神为原则来对待。(2)对于朝农的入殖地。难以避免军事上、行政上必要之掣肘,且伪满洲国自主地决定每个入殖地,故原则上将“全满”作为入殖地。(3)将朝农移民入殖形态分为集团、集合及分散三种,每年大致1万户。而集团、集合及分散移民,总体上必须有本府(朝鲜总督府)所指定的移住证。(4)分散的已移居朝农,凡已定居者,不再使之成为集合移民。^③

为了不影响日本人的国策移民,日本政府对待朝鲜人移民的政策是在统一的管制之下,主要将其移入中国东北的东南地区,尽可能地避免其与日本移民争夺北满地区的土地。

成为日本移民组成部分的朝鲜移民,无法摆脱日本帝国二等臣民的地位。朝鲜移民作为一个族群而言,在伪满洲国的政治地位很低,绝大多数成员身处社会底层,例如731部队的细菌实验对象同样包括朝鲜人在内。由于朝鲜移民多善耕种水田,其开发的农地更容易成为日本移民的首选土地,伴随着日本人移民团的入殖,朝鲜农民的水田多成为被没收的对象,其境遇与中国农户并无太大的差异。“在满朝农常被到处追逐,无安生之日,实甚可怜。”^④显然,“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之前移居的朝鲜农民受中国地主和朝鲜地主的剥削,但占领后的状况,除还残留有地主统治,佃耕地租率增大的情况外,还表现为帝国主义统治者的直接统治取代了地主的统治”^⑤。

结 语

日本的殖民帝国是依赖军事力量建立和维系的,因此当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军队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刻,日本帝国在海外殖民地的统治体系就彻底崩塌了。帝国的消失缺少了一个瓦解的历史过程,海外移民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出现全面退潮现象也是必然的结果。作为服从日本帝国殖民战略需要而产生的国策移民们,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政治的牺牲品,出现了所谓的“残留夫人”、“残留孤儿”等特殊历史问题。战后,朝鲜移民因其特定的身份,其资产同样被中国国民政府视为敌伪资产予以没收,其人员被作为韩侨遣返回国。日本移民和朝鲜移民如同大海落潮一样,随着大日本帝国的崩溃而轰然退去。显然,这种纯粹出于国家政治目的的移民潮违背了人口移动的自然规律,只能是暂时的,不具备可持续的社会基础。

责任编辑:刘莉

① 松村高夫「日本帝国主义下における‘满洲’への朝鮮人移動について」『三田学会雑誌』Vol. 63, No. 6, 1970, 87頁。

② 临时满洲开拓民审议会编《临时满洲开拓民审议会会议录》(1940),转引自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孟宪章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5页。

③ 朝鮮總督府『朝鮮總督府施政三十年史』東京:名著出版、1972、898頁。

④ 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孟宪章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6页。

⑤ 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孟宪章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1页。